



光榮的抉擇

——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回忆录

光荣的抉择

下

蔡惠霖 孙维吼 编

国防大学出版社

2620/24

光 荣 的 抉 择
(下)

蔡惠霖 孙维吼 编

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18.25 字数：430千字

1987年8月第一版（北京）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3489·029 定价：3.50元

中南战场

目 录

(下)

中 南 战 场

- 我在金口起义的经过……………张 轸(1)
- 国民党军第三〇九师金口起义经过……………涂建堂(17)
- 争取张轸将军起义……………张尹人(31)
- 湖南起义的经过……………李 觉(51)
- 陈明仁长沙起义侧记……………吴相和(62)
- 奉命去长沙促成程潜、陈明仁起义……………李明灏(71)
- 追随程潜起义的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萧作霖(78)
- 我参加湖南起义以及同白崇禧周旋的经过……………唐 星(92)
- 国民党军第一〇三师三水起义与三十九军
覆灭……………陈一匡(113)

西 南 战 场

-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……………刘文辉(131)
- 我在川西起义的经过……………邓锡侯(149)
- 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西康起义纪实……………杨家禄(165)
- 川西起义经过……………严啸虎(178)
- 释放张群……………卢 汉(186)
- 云南和平解放前后……………龙泽汇(188)
- 昆明起义记事……………杨肇骥(218)

附：第八军、第二十六军拒绝起义后的下场

-曾天戈(231)
- 走向光明.....郭汝瑰(253)
- 宜宾起义.....萧烈(277)
- 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在贵州起义经过
-王伯勋、王景渊(284)
- 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军组成和起义的情况.....吴行中(306)
- 贵州省绥靖区起义经过.....萧开训(315)
- 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在川西起义前后.....傅英道(330)
- 国民党军第三六一师从重庆溃退到什邡起义.....陈章文(340)
- 罗广文率领第十五兵团起义经过
-赵秀崑、张荣宪、贾应华、吴建新、李维勋(346)
- 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
- 的经过.....陈克非(368)
-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从撤出陕西到川北起义.....裴昌会(408)
- 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起义前的几点回忆.....李振(419)
- 国民党第三十军在成都外围起义经过.....鲁崇义(431)
- 国民党军李文第五兵团在川西投降纪略.....王应尊(436)

海、空 军

(附：非将领人员回忆)

- 飞向延安.....刘善本(443)
- 震撼石头城.....俞渤(461)
- 关于重庆舰起义的一些历史情况.....甄海莲(470)
- 灵甫舰部分人员起义的主要经过.....高光(476)
- 附：《“灵甫”号官兵起义宣言》.....(504)
- 南京江面上的壮举.....陈务鸟(507)

国民党云南空军起义概述.....张有谷(521)

回忆云南空军起义.....李加谊(528)

附 录

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起义、投诚大事记.....(539)

我在金口起义的经过

张 轸*

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，我率原国民党第十九兵团所属一二七军一个师、一二八军三个师，共二万余人，于武汉解放前夕在武昌以南金口、贺胜桥一带起义，投向人民，参加革命。这一行动，从酝酿准备到高举义旗，历时一年有余。在此期间，共产党解放军的多方争取，个人思想认识的变化发展，内部各种力量的矛盾斗争，情况相当复杂。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，仅就记忆所及，概述如次：

一、起义前的河南形势

河南地处中原，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我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大部时间都在河南。解放战争第一年，我先后任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和武汉行辕副主任等职，没有指挥作战。这一年，河南全省除部分地区有解放军地方部队活动之外，均没有大的战斗。但在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仅以一年时间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，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后，河南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

一九四七年七、八月间，刘邓大军飞渡黄河，在鲁西南消灭了国民党军五、六万人之后，乘胜跨越陇海铁路，沿平汉铁

* 作者原系国民党河南省主席、“华中剿匪总司令部”副总司令、第十九兵团司令

路以东地区大踏步南进。蒋介石亲飞开封视察，急令武汉行辕主任程潜设前进指挥所于漯河，并指派我兼任前进指挥所主任，负责前线指挥事宜。我即派两个整编师和一个独立旅到汝河南岸的汝南埠一带阻击。刘邓大军冲过阻击线，强渡汝河和淮河，继续千里跃进，于初冬季节进入大别山区，从根本上动摇了豫南地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。

陈谢大军也在一九四七年八、九月间渡过黄河，向豫西腹地挺进。在消灭国民党军第十师、活捉师长武庭麟和全歼青年军二〇六师之后，乘胜前进，仅仅几天功夫，就先后解放了郟县、宝丰、鲁山、临汝、登丰、叶县、方城、南召等八县城，切断了伏牛山南的战略据点——南阳与郑、汴之间的联络，对平汉线形成威胁，迫使我把前进指挥所从漯河撤退到驻马店。

正当刘邓、陈谢大军分别在大别山区和伏牛山区巩固根据地的时候，陈粟大军又在粉碎山东国民党军重点进攻之后，进军豫东，向西直捣平汉铁路。这时陈谢兵团由西向东，对平汉铁路形成夹击，并在西平县一带，吃掉陈铁军的整编第三师。从此，郑州至驻马店这一大段铁路就不再通车了。

一九四八年六月，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，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化装潜逃，仅以身免，接着解放军又主动撤出开封，集中兵力在睢、杞地带歼灭了区寿年兵团。到了秋季，解放军第二次解放开封，同时解放了郑州，中原大地各分散的解放区，便联结在一起了。

综上所述，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里，河南战局急转直下，国民党统治体系陷于土崩瓦解。刘邓大军在豫南、陈谢大军在豫西、陈粟大军在豫东，互为犄角。决定南京政府最后命运的中原地区的有利战略形势，已经为人民解放军牢固地控制住了。在这一年的中原战役中，我始终处于前线指挥的地位。我

先后指挥过十四个整编师和四个独立旅，但终于难免整团，整师的覆没。一九四八年四月。我亲自带领三个整编师驰援南阳，若不是急进急退，几乎被解放军包围吃掉。

解放战争初期，蒋介石提出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武装，我是决不相信的；但共产党能打败蒋介石，我也是怀疑的。解放战争两年形势的发展，特别是第二年河南形势的发展，对我的影响很大。从全国来说，解放军要全胜，国民党要失败的定局，我已模模糊糊地看到了。

二、积极筹集起义“资本”

一九四八年夏季，蒋介石为了挽回中原战局颓势及加紧对华中地区的统治，决定改组武汉指挥系统，程潜由武汉行辕主任改任长沙行辕主任，迁往湖南。另设“华中剿总”司令部于武汉，任命白崇禧为总司令，我为副总司令。随着武汉指挥系统的改组，前进指挥所退到信阳，改为第五绥靖区司令部，我兼任司令官。开封第一次解放后，蒋介石免去刘茂恩的河南省主席的职务，改由我接替。我于九月间到开封接任后，即将省政府迁到信阳办公，至此，从形式上看，我总揽河南的军政大权，但实际上，所谓河南省，其管辖的范围不过信阳附近十几个县城而已，我不是蒋介石的嫡系，而且过去反过蒋，这时让我当河南省主席，无非是空头人情。我当时指挥的部队，没有一个师是我的基本队伍。第五绥靖区司令部所在的信阳，已成大别山北的孤立据点。此时此地，此情此景。何去何从，是我考虑的最突出的一个问题。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、瞻前顾后，唯有起义一途。

但是我又想，起义不能空着手，光杆司令的起义，对战局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。最好有十个师，至少也要有五个师，

这才是对革命送的一份象样的礼物，这也就是我当时认为的“政治资本”，回想大革命时，我在第六军当团长、师长，党代表林伯渠对我很好。我要是起义了，他一定会关照我，但林老的关照，也必须有大大的“政治资本”作基础。“资本”大一些，起义后的地位也会高一些。因此，我便开始积极为筹集起义“资本”而耗费苦心。

起初，我认为吴绍周的八十五军是原十三军的底子（抗战时，我任过十三军军长），同我有老关系，可以跟我起义。我还认为鲁道源的五十八军也可跟我一道行动。有了这两个军，再加上一些河南省属的保安旅、保安团，本钱也就象样了。不料，淮海战役开始，黄维奉命成立第十二兵团，蒋介石把当时正由我指挥的吴绍周、胡珪等三个军拨给了黄维。为此，我曾向白崇禧力请把吴绍周军留下，以鲁道源军替换，但蒋介石不答应。当吴军业已开拔之时，我又作最后努力，使该军在新蔡滞留十天之久，但最后未能如愿。吴绍周走后，鲁道源便成了我谋同起义的主要对象，我觉得鲁是云南人，不是蒋介石的嫡系，同我的交情也比较好，可能问题不大。但密商了三次，都没有取得他的同意。于是，我便打消了从正规部队找“资本”的念头，只好另起炉灶，运用省主席和绥靖区司令官的名义，收编地方团队。

河南地处中州，在军阀混战时期，战乱频仍，素有兵多、枪多之称，各县均有地方保安团队。我认为这是筹集“资本”的好条件。我通过南京国防部长顾祝同向蒋介石建议，由我负责成立几个绥靖旅，将来拨补给正规军，以解决当时兵源不足的困难。经蒋同意，我就取得了在国民党政权中扩军的合法地位。于是，我就派了十几个亲信旧部去横川、确山、桐柏、遂平、正阳、罗山、光山、信阳、息县等地当专员或县长。我给他们

的主要任务就是收编地方团队，组成绥靖旅或保安旅，同时收容失学青年，编为各旅政工队或宣传队。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就拼凑了十个旅。这些旅长是：辛少亭、涂建堂、鲍汝澧、阮勋、张继烈、张玉龙、程晓沧、郭心波、刘子仁和张旭东。其中郭心波和刘子仁是祸害豫东多年的土顽。张旭东是豫南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，我也良莠不分地搜罗了他们。后来几经整顿，把十个旅编成两个军。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，一二八军军长辛少亭，原来的旅长大都升了师长，蒋介石又给了个第十九兵团的番号，我兼兵团司令官。至此，我梦寐以求的起义“资本”便初具规模了。

三、起义和反起义的内部斗争

我之所以产生起义的念头，绝不是偶然的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共产党对我就有一些影响，特别是林老（伯渠）对我思想的进步帮助更大。抗日战争初期，我在豫北任师管区司令，曾先后邀请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部的代表朱瑞和唐天际两同志，到新乡讲过游击战术和群众工作。后来在重庆，又和周恩来、叶剑英、林伯渠、邓颖超等领导人有过接触，均受到一定的影响。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开始以前，我主动请民主人士李世璋（生前任民革中央副主席）代表我，通过华东地区的党组织，向党中央反映我的思想动态和打算。与此同时，解放军也派出工作人员加紧对我争取。一九四七年底，通过开封地下党组织的介绍，晋冀鲁豫军区的方敬之同志即同我的大女婿张尹人（横川中学校长）建立了工作关系。一九四八年五月起，方敬之同志（化名张子庸）多次到信阳，都住在我大女儿张世佛家里，并在我的家属和亲友之间开展了宣传、酝酿和争取的工作。加上我自己对亲信旧部的秘密动员，逐渐在我身边

形成一股支持我奔暗投明，走起义道路的力量，这股进步力量，包括五绥区政工处处长张了且、军需处处长张鉴古、军长辛少亭；师长涂建堂、张玉龙、鲍汝澧、张继烈、办公室秘书吴高明等，他们及其所领导的部队，是我兵团起义的积极支持者和骨干力量。

我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，但我的主要助手副司令朱其平、政务处长范效纯，都是起义的坚决反对派。朱是日本士官生，跟我十几年，我对他信任不疑，人权和财权都交他掌握。但他思想顽固，坚决反共。关于起义的问题，我同他争论过好多次，他始终反对。他的基本论点是：国民党虽然暂时失败，将来会取得胜利。因为共产党的后台是苏联，国民党的后台是美国。战争主要是经济战和技术战，这两方面美国都比苏联强得多，一旦美苏战争爆发，美国必胜。范效纯是我的学生。是CC分子，曾当过开封反省院院长，迫害过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。他害怕共产党，死心塌地反共。但他不象朱其平那样敢于和我当面顶撞，却经常给朱烧底火。他俩狼狈为奸，在下边煽动破坏，致使师长阮勋长期托病住院不回部队，张旭东顽固到底，逃向台湾。然而，他们两人除了有共同的顽固立场外，还有一个共同的旧观念，重视私人交情，好合好散。在我说不服他们，他们也影响不了我的情况下，他俩都表示愿意离开部队。我知其不可挽留，就每人送了一些路费，让他们各自东西了。

此外，在起义酝酿过程中，军统、中统特务对我监视甚严，我对他们也深为厌恶，但又不能不虚与应付。以李建业为处长的五绥区司令部第二处，就是国防部第二厅的派出机构。他们不仅控制了军事情报，也过问地方政情变化，还有蒋介石侍从室派来的联络组（军以上的单位才有），既要审阅下面的

报告，又要过目我发出的命令，他们自带电台，每晚与侍从室直接通报联系。河南省军统特务头子岳焯远，被派到十九兵团当联络组长，一直住在兵团司令部，对我实行监视。经常对我指名某某是共产党，某某有嫌疑，某某部队靠不住，要严肃整顿。颐指气使，十分猖狂。十九兵团成立时，我捷足保荐张了且为兵团政工处长，就是针对国防部第二厅再派人来的一项抵制措施。

我部起义，酝酿时间较久，除辛、涂、鲍、张等骨干力量心中有底外，刘子仁、郭心波、张旭东等，从朱其平、赵子立处亦有所闻。至于其他高级人员和一般特务，因为我当时利用追随李宗仁、白崇禧逼蒋下台的所谓“和平运动”作掩护，使人真假莫辨，起义活动才得以向前推进。但也有人看出真相。如蒋介石侍从室派驻华中“剿总”的联络组长刘伯龙，他就曾多次公开对人说：“委员长对张轸推心置腹，给以军政大权，他还想造反，我非杀他不可。”斗争之尖锐复杂，可以想见。

四、解放武汉，光荣起义

1. 在武汉起义是党的指示

我在中原形势发生战略转折，退守信阳以后，就产生了起义的念头，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起义，还没有一定思想准备。一九四八年底，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力劝我就在信阳，以河南军政长官名义联合参议会举行起义。他说：“早起义比晚起义好，早起义就是资本，等到解放军来了再起义那就晚了。”我考虑到当时起义“资本”正在筹集，争取军、师长共同行动的工作还在秘密进行，仓促起义，力量单薄，势必会被国民党军消灭的可能。于是，我拒绝了刘的建议。

一九四九年元月初，我派张尹人随方敬之同志到解放区，

二野副政委邓子恢同志在开封接见了。邓老指示：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，比原来预计的快得多，今后发展将要更快，愿意依靠人民，共产党表示欢迎，希望早下决心，起义地点和时机，最好在解放武汉时，影响要大些。邓老还告诉张尹人，决定派丁一处长到信阳去联系，待张尹人把丁一同志接到信阳并向我传达了邓老的指示以后，我决定在解放武汉时起义的念头就基本确定了。

正当这时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，南京政府大厦将倾。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，联合程潜秘密策划了个所谓“五省联盟”的活动，目的在于逼蒋介石下台，由副总统李宗仁取而代之。白崇禧极力拉我为他效劳，并怂恿我同解放军接洽起义，用作缓兵之计，迟滞解放军南下。他还假惺惺地对我说：“再派人去解放区时，就说是代表我们两人的。”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是：李宗仁代替蒋介石之后，则取美帝的信任，内与共产党分庭抗礼，划江而治，造成南北朝的局面。事为蒋介石及时侦知，蒋便于元月二十一日自动宣布下野，回到浙江奉化，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。不久，李宗仁便组织了代表团飞往北平与中共和谈。

丁一同志到信阳，先住在我女儿家中，后来就住在涂建堂旅部，换上了军服，经常随涂出入。丁一同志来我部的时间虽不很长，但对我部进步力量鼓舞很大，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了党的政策，坚定了起义的信心，从而扩大了影响。由于我不急于在信阳起义，以及对李宗仁与中共的和谈还抱有一定的幻想，加上信阳、武汉到处是国民党军统、中统特务，担心丁一同志的安全，便于二月下旬派张了且和张尹人送丁一同志回解放区，在漯河，陈赓兵团的周希汉军长接见了他们二人。周希汉军长让他俩向我转达两点：一、形势发展很快，解放大军向江南

进军为时不会很长了；二、希望我早下决心，随时派人来联系。

2. 退出河南，决定起义

一九四九年三月，我奉命由信阳撤退到湖北。从此，河南省政府便成了流亡政府，我将省府工作交给秘书长罗震全权处理，自己则专心致力于新成立的部队工作。部队先在花园、孝感一带整训。接着开往武昌以南沿江一带，一边整训一边担任江防。第五绥靖区司令部改组为第十九兵团司令部，驻在粤汉铁路线上的贺胜桥车站。

张了且和张尹人几次去解放区，带回了許多书刊报纸。其中有《论联合政府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土地法大纲》、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以及新华社的一些评论，我都认真地学习了，很有收获，对当时的形势也进一步看得较为清楚了。李宗仁虽然代理了总统，但蒋介石仍然坐在奉化向全国发号施令，美帝国主义所扶持的仍然是蒋而不是李，李宗仁所派出的代表团与中共的和谈，决达不到李、白梦想的划江而治的目的。白崇禧几个月来怂恿我同共产党联系，并让我收编团队，由十个旅改编为两个军，以正规军的番号调到江南，这不过是为了壮大他桂系的实力，继续与人民为敌，而决不是让我带着几万人和枪去投共产党。因此，我再也不能跟着白崇禧干下去了。此时，邓老要我在解放武汉时起义的指示，已变成我的决心。于是，我就去找我的老长官程潜商量，因为他同林老的关系更为密切。三、四两月，我三次到长沙和程密谈。他对我决心在武汉起义极为支持，我同他最后约定，我先在武汉行动，他继在长沙行动。后来，我还派了武汉大学教授武剑西去长沙，向程潜汇报了我起义的准备情况。

3. 第一个起义方案

我的部队从河南撤退到湖北的时候，白崇禧是准备沿江设防，固守武汉的。开始，他要我的部队担任武汉的城防。我想，这一下可以如愿以偿了。但我的部队新由地方团改队编为正规军，虽有番号，而粮饷不足，白崇禧虽竭力补助，终究相差太远。于是，他又将武汉城防的任务交给了鲁道源的五十八军，而将我兵团的两个军调到长江以南的武昌、嘉鱼、咸宁、蒲圻一带，仍然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。我想，这样也好，你如死守武汉，我便在我的防地上迎接解放军过江。

白崇禧交给我的江防任务是从武昌到嘉鱼这一段，一共九十华里。地处武汉上游，江北面便是解放军江汉军区的根据地。离武汉六十华里的金口镇，有沟通大江南北的公路汽车渡口，是扼守武汉上游的咽喉。如果解放军在上游渡江包围武汉，金口是最理想的渡口。因此，我在布置江防任务时，把早有起义决心的一二八军各师摆在贺胜桥兵团部以北，军部驻在武昌县的山坡镇。而将一二七军各师摆在贺胜桥以南，军部驻在咸宁县的横沟桥。在一二八军中，我又选派了鲍汝澧师专守金口一段江防。鲍汝澧对于要在金口迎接解放军渡江的光荣任务非常明确。他进驻金口以后，即积极修整码头，控制船只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涂建堂、张继烈、张玉龙等师，则分驻在铁路和公路沿线的山坡、土地堂一带，一面控制铁路公路交通，一面作鲍师的后卫。

布置就绪以后，我便将我部担任江防及在金口迎接解放军渡江的准备情况，托中共中原局社会部的工作人员赵子平送到了解放区。

我这支新拼凑而成的起义队伍，是来自不同县、区的地方武装，封建地域观念和私人交情特别浓厚。为了统一他们的思想行动，我在贺胜桥举办了一个训练班，由张了且主持，参加